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

焦丽颖[1,2] 许 燕[1] 田 一[3] 郭 震[1] 赵锦哲[1]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3]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36)

摘　要 善恶问题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话题，在对他人进行知觉时，人们首先关心的信息是什么，是否会对不同类型善恶特质有所权衡？研究基于人格心理学视角，通过 4 个研究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首先探究了人格的道德概念激活时善恶的差异，并以代表性、好恶度、特质度和重要性为衡量指标分别考察了不同类型善恶特质的核心程度差异。结果发现，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体现在两个方面：（1）善恶人格间的差序，在人格的道德范畴中，存在善人格的优先效应；（2）善恶人格内的差序，“善”的核心由内到外为尽责诚信、仁爱友善与包容大度、利他奉献；“恶”的核心由内到外为凶恶残忍、背信弃义与污蔑陷害、虚假伪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人的善恶观，为善恶领域的探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善恶人格；人格结构；特质差序；特质度；中国文化

1 引言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需要对他人的品行和能力进行感知，并对其形成整体印象，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不同类型特质的贡献性和重要程度。其中，道德类特质的重要性最强(Brambilla et al., 2011; Goodwin, 2015; Landy et al., 2018; Wojciszke et al., 1998)。人们在感知或评价他人道德与否时，通常使用“善恶”来描述，将善恶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戴景平, 2007)。总之，从人格心理学角度而言，善恶人格特质属于最无争议的道德类特质。那么，人们在提及道德时，首先考虑的是善还是恶？当人们只对善或恶进行判断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善（或恶）特质，是否会认为其核心程度存在差异？

人格心理学关于特质的研究大都基于“较高层次”的人格特征，如宜人性、尽责性等

收稿日期：2021-6-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6711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63)资助。

通讯作者：许燕, E-mail: xuyan@bnu.edu.cn

更为上位的维度，但这种测量方式会忽略掉人格内部的层次结构，损失掉“较低层次”人格特征的独特性，如各维度所包含的子特征面。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个体知觉研究大都将道德与其他特质（能力或社交性等）进行区分，考察道德的优先性和支配性(Landy et al., 2016)，但这种比较方式对道德具有极大的概括性，似乎“道德”一词就含括了人际互动中的所有优劣品质特征，这对于精准理解和预测人们的善恶行为是不够的(Baumert et al., 2013; Ellemers, 2017)。事实上，道德本身也具有多种分类，测试不同类型的道德在对他人知觉和印象形成方面是否同等重要也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Brambilla et al., 2021; Goodwin, 2015)。

因此，为进一步理解人们在社会知觉过程中的价值体系排序，将道德品质进行更细致的维度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善恶人格的提出为其提供了新思路。善恶人格被认为是个体具有社会道德评价意义的内在心理品质(焦丽颖 等, 2019)，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许多人格特质被认为与善恶有关，并逐渐被重视和研究(Moshagen et al., 2018)。随着研究方向的不断扩展、研究主题的不断增加，“光明”和“黑暗”的人格特质被越来越深入探究，成为心理学领域新兴的研究主题(Gouveia et al., 2020; Hill & Roberts, 2010; Neumann et al., 2020; Walker, 2004)。以往许多研究以善恶为出发点，探讨相关人格概念或品质特征，如诚实-谦恭、宜人性、暗黑人格、虐待等(Kaufman et al., 2019; Paulhus & Williams, 2002; Jones & Figueredo, 2013; Thielmann et al., 2020)。但是，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各文化下善或恶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个具体的人格特质，由于关心的问题各不相同，研究中所使用的善恶特质也具有较大的分散性。

善恶人格系统地整合了具有典型善恶特征的人格构念，研究者从基础层面界定了善恶人格的内涵，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善恶人格的特点(焦丽颖 等, 2019)。善恶人格反映了中国文化下人格结构中独特的道德成分，具有结构性、倾向性、社会性和道德性等核心特征(焦丽颖, 2021)。其在承认特质结构的同时，也包含了详细的善恶特质单元，为人格评估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框架。因此，本研究以善恶人格为主题，探究当人们对他人进行知觉时，善恶人格之间及善恶人格内部不同类型特质的差序，以期扩展人格结构的相关理论，并为道德领域的个体知觉提供研究基础。

1.1 善恶人格的结构

人格首先是一种结构化的系统(郭永玉, 2016)，伴随善恶人格概念而来的首要问题便是善恶人格的结构，以往研究也验证了与善恶相关的人格具有内在结构。例如，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中国传统人格的五个因素(燕国材, 刘同辉, 2005)，智仁勇、恭而有礼、喻义怀德、有所不为、持己无争构成了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葛枭语, 侯玉波, 2021)。此外，美德被视为是一种道德良好的人格特征， Peterson 和 Seligman(2004)基于以往的哲学著作和伦理类书籍，提出了美德的六个成分，这个标准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张昊天 等, 2019)。并且还有大量的研究者采用理论取向或实证方法探究了美德的结构(e.g., Cawley et al., 2000; De Raad & Van Oudenhoven, 2011; Morales-Vives et al., 2014; Shryack et al., 2010; 沐守宽, 顾海根, 2010; 喻丰, 2014)。同时，道德人格同样具有其分类的结构(喻丰 等, 2013)，国内外研究者均已发现了道德人格包含多个因素(eg., Walker & Hennig, 2004; Walker & Pitts, 1998; 郭永军, 2010; 王云强, 郭本禹, 2011)。

善和恶的相关研究为善恶人格具有内在结构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张和云等人(2018)对善良人格结构进行探究，发现了其二阶四因子结构。研究者们也以多个维度建构了恶人格，例如采用利己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病态、自恋和虐待等特质测量人格的黑暗面(Jones & Paulhus, 2014; Jonason & Webster, 2010; Moshagen et al., 2018)。此外，焦丽颖等人(2019)扎根于中国文化探究了善恶人格的内涵与结构，采用词汇学方法，以中国人自己的语言为载体，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日常生活中善恶词汇进行分析。最终确立善人格包含四个因子，分别是：尽责诚信、利他奉献、仁爱友善、包容大度；恶人格包含四个因子，分别是：凶恶残忍、虚假伪善、污蔑陷害、背信弃义。

1.2 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

人格结构存在层次，奥尔波特认为个人特质有首要特质、中心特质和次要特质之分(Allport, 1937)，卡特尔也把人格特质区分为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Cattell, 1950)。以往的人格研究通常构建的是人格特征的纵向差序，某个较高层次的构念可能包含多个较低层次的子构念(Chen et al, 2012)，例如，诚实-谦恭是更上位的人格特征，包含 4 个下位因子——真诚、公平、不贪婪和谦逊(Ashton & Lee, 2007)。前文提到的道德人格、D 人格等都是建立在这种纵向差序的基础上。此外，人格的结构也存在横向差序，即：对于处在同一层次的特

征，互相之间也存在重要性差异。因素载荷结果和效标效度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这类差序(Wood, 2015)。本研究中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即是这种横向差序，其关注的是当人们对他人进行善恶知觉时，善恶人格特征的优先效应。

以往相关研究为善恶的横向差序提供了支持。Kupperman(1991)区分了绝对美德和依赖美德，前者是无条件的善，如善良、诚实、可信任和公平等核心善良特质，后者只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是好的，如守纪、果断和奉献等价值承诺特质，这类特质只有当核心善良特质存在时才能体现出善的意义(Piazza, Goodwin et al., 2014)。同样，也有研究者指出“诚实”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美德，其他美德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它(Fazeli, 2019)。政治领域同样出现了美德要求的层次，在民众期望领导所拥有的品质中，诚实占据首位，并且这种现象具有不同文化的普遍性(Allen et al., 2016)。即使都是“善”人格特质，它们对人格的预测作用也存在差异，“诚实”和“可信任”往往比其他社会道德特征更重要(Brambilla et al., 2016; Willis & Todorov, 2006)。

恶人格特质也有横向梯度(Berkowitz, 1999)。Gray 等人(2012)提出了道德二元论(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TDM)，认为“伤害”是人们提及道德时考虑最多、最频繁的因素之一，它是社会关系中道德冒犯的原型，是人们考量某个行为道德与否不可忽视的因素，道德判断的核心便是感知到的伤害(Gray et al., 2014; Piazza, Landy et al., 2014)。Shklar(1984)曾论述到，“残忍”是万恶之首，而其他如虚伪、势利和背叛在评价恶中都没有残忍的影响力大。也有研究发现，人们对自私行为的评价比不公平行为的评价更消极(Klein & Epley, 2014)。此外，有研究者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人格中的恶成分进行了探讨，其研究发现：“人际操纵”和“冷漠”具有最高的中心性，该中心性在不同的样本中得到了验证(Marcus et al., 2018)。

由此可见，目前研究已经开始区分善恶在横向差序上的核心与边缘特质。但是，一方面，从研究结构而言，已有研究多以单维度的视角考察道德，而没有同时将道德和不道德进行更细化的区分；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而言，以往大多数道德优先效应的研究对道德的测量不够全面，例如采用“诚实”和“可信任”等特质代表道德，然而道德远比这些特质更广泛(Brambilla et al., 2021)。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以中国文化下的善恶人格为主题，从善恶双维度视角建构道德，探究不同善恶特质核心性的差异。综合以往研究理论和结果，本研究提出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假设**：

假设 1：在社会知觉过程中，善、恶人格的优先性不同；

假设 2：不同类型善恶特质对判断善恶的核心程度存在差异。

1.3 善恶人格特质核心程度的评价指标

以往关于特质间差异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会关注特质本身的属性或对特质重要性的评价(e.g., Cottrell et al., 2007; Goodwin et al., 2014)；也会从行为证据和被确认/推翻的容易程度上探究特质之间差异性(e.g., Gidron et al., 1993; Rothbart & Park, 1986)。本研究整合了以往特质评价及特质推理相关研究中的评价指标，试图通过以下四个指标来更加全面地对善恶人格特质的核心程度差异进行测量：

（1）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指特质对于判断个体善恶的有用程度，代表性越高，表示该特质在进行判断时对善恶人格的有用程度越高。Goodwin 等(2014)就曾在其研究中测量了目标特质对判断道德和人格的有用程度，并分析二者的契合性，来识别善/恶（道德/不道德）特质与其他类型特质对判断人格核心程度的差异。

（2）好恶度（Desirability），好恶度是个体价值观的体现(黄希庭, 张蜀林, 1992)，反映人们对每个特质的喜好程度。Anderson(1968)对 555 个人格特征进行好恶度评分，发现人们最喜爱的特质为“诚实的”。黄希庭和张蜀林(1992)对 562 个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评分结果显示，国内大学生们认为排名前三的坏人格特征为：下流的、狠毒的和奸诈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好恶度和重要性是高度相关的(Cottrell et al., 2007)，后者则反映了特质的核心程度。因此，研究假设对于善特质，特质的好恶度越高，表示更靠近善的核心；对于恶特质，特质的好恶度越低，表示更靠近恶的核心。

（3）特质度（Scope of trait），描述的是人们确认一种特质所需要的证实证据的最小行为频率，是一种对特质进行推断的内隐量化指标(Gidron et al., 1993)。在生活中，人们对于人格特质的判断通常会基于个体的行为线索，而特质度便体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观察对象的行为而形成对其人格特质判断的归纳力度(冯雪 等, 2016)。

一般而言，好恶度影响特质度，确认一个正面属性的特质要比确认一个负面属性的特质更难。个体对于道德和不道德特质的判断基于不同的标准(Reeder, 1993)。研究发现，相比确认某个目标人物确实拥有消极的（不道德）特质，人们确认其有积极的（道德）特质需要更多的行为证据(Klein & O’Brien, 2016; Gidron et al., 1993)。由此可以推断，不同善恶

特质的特质度存在差异，善特质的特质度要大于恶特质的特质度。

此外，特质度具有互补性，并且受特质强度的影响(Gidron et al., 1993; 冯雪 等, 2016)。具体来讲，如果 A 和 B 分别代表两个积极特质，而 A* 和 B* 分别代表 A 和 B 的反义词，S 代表特质度，那么

S（A）> S（B），意味着 S（A*）< S（B*）

当特质的强度越强时，人们对该特质度的判断越高，表示确认个体拥有该特质需要更多的行为证据。这可能意味着，一个特质越是积极的、越靠近善的核心概念，越具有高的特质度，人们对于确定该特质所需要的行为证据越高。反之，越是被厌恶、不被接受的特质，越具有低的特质度，人们对于确定该特质所需要的行为证据越少。

（4）重要性（Importance）**，**测量了每个特质对于判断善恶的重要程度，传达了善恶特征不同层次的信息。以往有研究者在研究社会知觉过程中哪种特质更重要时，便让被试直接评估不同特质重要程度 (Abele & Wojciszke, 2007; Wood, 2015)，迫使个体权衡不同特征的重要性，以此区分哪些价值特征是“必需品”，哪些是“附加品”(Cottrell et al., 2007)。

1.4 当前研究

本研究拟通过 4 个研究，多角度探究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研究框架和逻辑如图 1 所示，研究 1 从整体角度，通过迫选方式使被试权衡不同特征的重要性，探索善或恶人格的优先效应。研究 2 从特质属性的角度，以**代表性**为指标，旨在评估不同类型的特质对于判断个体善（研究 2a）/恶（研究 2b）的有用程度，初步探究各特质在善恶人格判断过程中的差序性。研究 3 从特质推理的角度，分别以**好恶度和特质度**为衡量标准，力求验证善恶各维度在行为——特质判断过程中的差序性。研究 4 通过排序的方式，直接探究“核心”与“边缘”的两类特质是否真的在**重要性**上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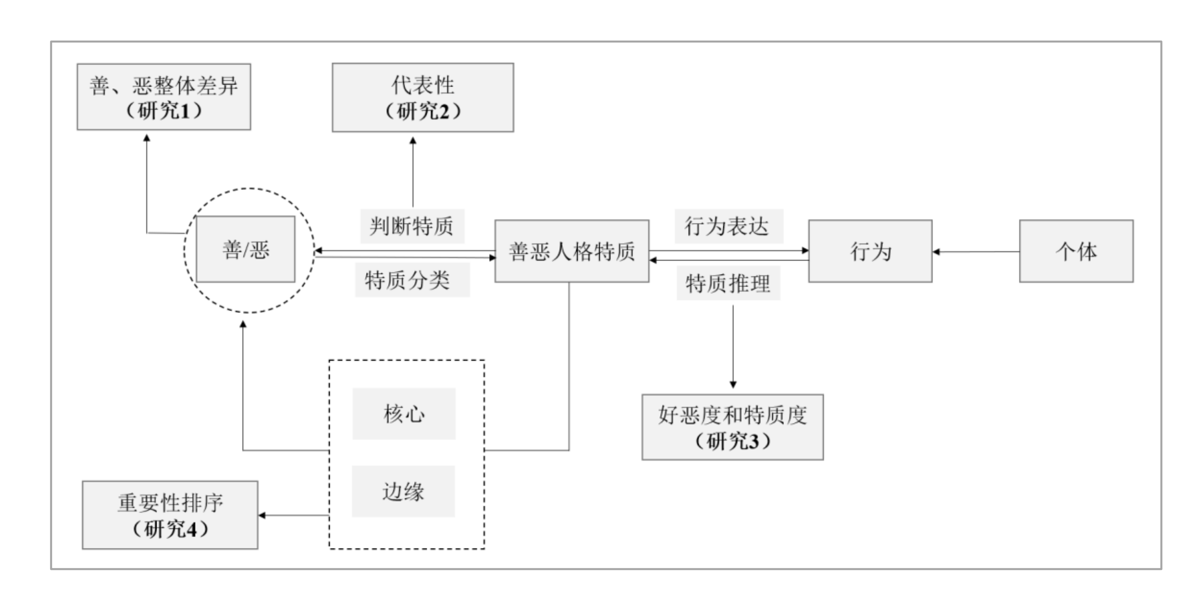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和逻辑图

2 研究 1 道德相关人格概念的善恶差序

研究旨在探索当提及“道德”范畴相关人格概念时，人们主要激活的是其积极（善）方面，还是消极（恶）方面。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通过网络招募被试 182 名，所有被试均为有效被试，其中男性 69 名，女性 113 名，被试年龄在 18 至 67 岁，平均年龄为 M = 29.35，SD = 10.70。

2.1.2 研究工具

善恶人格特质词汇。参考焦丽颖等(2019)研究中的善恶人格词库，从善、恶人格每个维度中随机选取至少一个特质词，共选出 5 个善特质词汇和 5 个恶特质词汇。善特质词汇为诚信的、肯牺牲的、有同情心的、宽宏大量的和正义的；恶特质词汇为凶残的、残忍的、伪善的、好陷害他人的和忘恩负义的。

非道德类特质词汇。研究加入 5 个非道德类特质词汇作为对比, 在对自我、他人或群体知觉过程中，能力被认为是与道德不同的一个维度(Brambilla et al., 2021; Goodwin et al., 2014; Reeder & Brewer,1979)。而且，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道德和能力的区分具有更多的实际意义(佐斌 等, 2015)，因此，本研究选择描述能力的词汇作为非道德类特质词汇。参考以往重

要性评定任务中使用的典型能力词汇(Abele & Wojciszke, 2007; 韦庆旺 等, 2018)，本研究选取的词汇分别为自信的、有效率的、有动力的、有能力的和聪明的。

2.1.3 研究过程

采用问卷星招募被试，被试被告知该研究是关于人们对道德认知的调查。调查开始之前，向被试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填答过程为完全匿名，指导被试按照真实想法作答。

被试需要从 15 个词汇中选出 5 个自己认为最能归于道德范畴的词汇，不可以多选，也不可以少选。为避免被试仅将道德与积极方面联系在一起，在指导语中强调被试选择属于“道德范畴”类的词汇，道德范畴的词汇既包含了道德的内容，也包含了不道德的内容。此外，为了避免词汇的呈现顺序对被试的选择产生影响，词汇设置为随机呈现。

最后，被试需要填写人口学信息，作答完毕后将得到 2 元作为报酬。

2.2 研究结果

图 2 呈现了每个词汇被选择的次数，结果显示，被选择最多的是“诚信的”，共 156 次，被选择最少的为“聪明的”，共 10 次。整体而言，善人格特质词汇比恶人格特质词汇被选择的次数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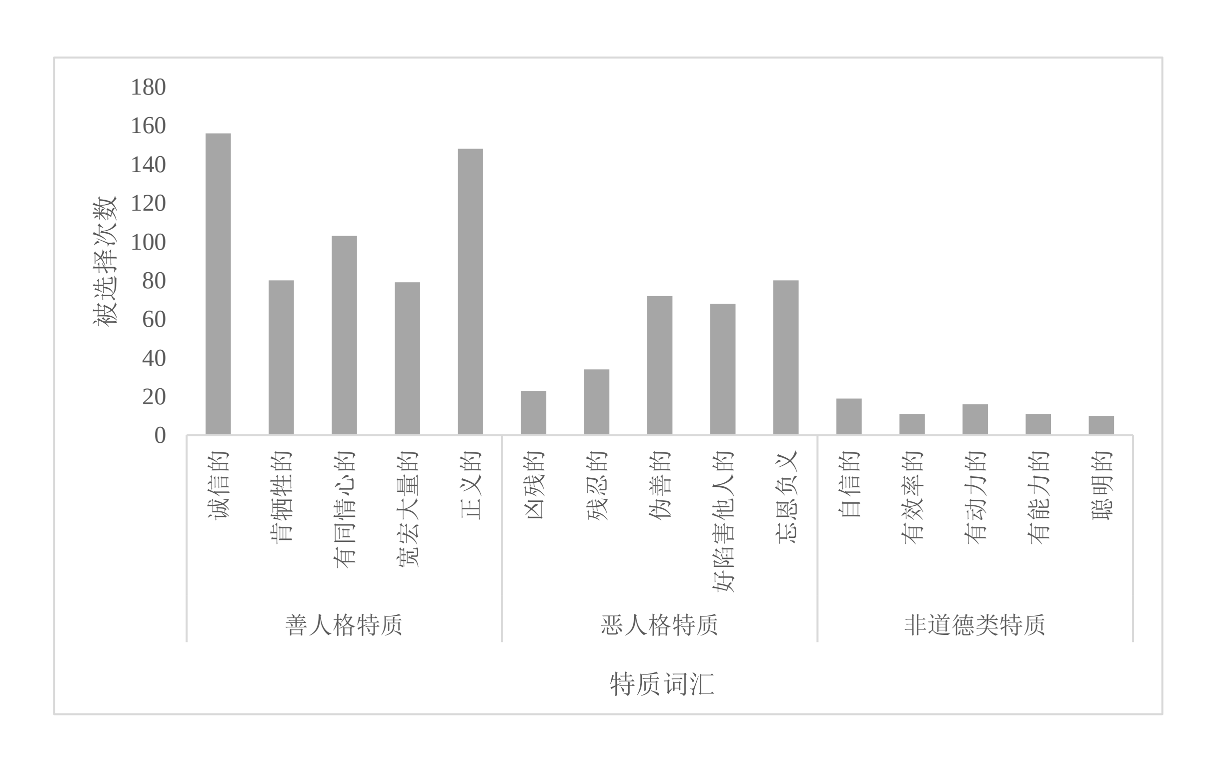


图 2 词汇选择频次图

以词汇的不同类别为自变量，以被试选择的个数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对不同类别词汇选择的个数差异显著，$F(2, 362) = 175.96$, $p < 0.001$, $\eta_p^2 = 0.49$。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事后检验，为了控制多重假设验证过程假阳性概率的增大，研究对 p 值采用 Benjamini-Hochberg (BH; Benjamini & Hochberg, 1995)方法进行了 FDR 校正，该校正方法相比 BH 方法而言更温和，其试图将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比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校正采用 R 语言中的 p.adjust 命令实现。被试选择善词汇的个数($M = 3.11$, $SD = 1.23$)显著多于恶词汇的个数($M = 1.52$, $SD = 1.34$)，显著多于其他类型词汇的个数($M = 0.37$, $SD = 0.06$)，$ps < 0.001$。被试选择恶词汇的个数显著多于其他类型词汇的个数，$p < 0.001$。

2.3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当人们谈及道德时，更多地选择善的词汇，验证了善恶人格间存在差序的假设，即当人们对道德概念进行知觉时，善人格表现出了优先效应。人们对善恶知觉的不对称性表明不能仅将善或恶作为同一个变量考虑(Jiao et al., 2021)，进一步突出了分开研究善、恶的重要性。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在选择最能归于道德范畴的词汇时，人们选择最多的两个词汇是“诚信的”和“正义的”，选择最少的两个词汇是“凶残的”和“残忍的”。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诚实、诚信、正义等积极词汇的频率较高，对此类词汇更熟悉(Roivainen, 2013, 2016; 王登峰, 崔红, 2005)，同时，新闻媒体在报道道德事件时会更频繁地宣传积极的特质，这也会增加人们的熟悉度，让人们认为积极的特质就是道德范畴。而凶残和残忍等词更多地与杀人、死刑等犯罪主题相关联，人们更多地将这些词归为法律范畴，当提及道德时，人们很少主动地将这类词汇联系起来。但值得一提的是，使用频率高或同义词较多并不能代表该特质更具有社会重要性(Wood, 2015)。那么，对于善或恶人格各自而言，不同特质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差异？研究 2~4 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3 研究 2 不同善恶人格特质的代表性差异

研究 2 拟以代表性为指标，分别探究善人格和恶人格内的特质差序。

3.1 研究 2a 善人格特质的代表性差异

3.1.1 研究方法

3.1.3.1 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平台招募被试共 150 名。施测时在题目中加入三道陷阱题目，如："此题请选择*非常有用*"，将没有通过陷阱题目测试或总作答时间低于 2 分钟的被试的作答结果标记为无效作答。最后得到有效被试 120 名（男性 30 名，女性 90 名）。被试年龄范围在 18 到 56 之间，平均年龄 $M = 21.04$，$SD = 3.70$。

3.1.3.2 研究工具

善人格词汇评定量表。研究采用焦丽颖等人(2019)得到的善人格词汇评定量表作为善人格词汇材料。共 27 个特质词，包含尽责诚信、利他奉献、仁爱友善、包容大度四个维度。此外，善恶人格被认为是个体具有社会道德评价意义的内在心理品质(焦丽颖 等, 2019)，为了探讨本研究所使用的善恶人格词汇是否真的具有道德评价意义，本研究计划测量特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赞许性来提供支持。稳定性指特质的稳定程度，以往研究发现，相比其他类型的人格特质，道德类特质更不容易发生改变(Goodwin et al., 2014)；社会赞许性为该特质被期望拥有的程度，有研究者指出，人们期望身边的人是高道德的(Cottrell et al., 2007)。本研究中善人格特质稳定性和社会赞许性评分一致性 α 分别为 0.93（各维度 α 值在 0.84~0.91 之间）和 0.93（各维度 α 值在 0.83~0.89 之间），每个特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赞许性评分都显著高于中等程度，$ps < 0.05$，表示人们认为善人格特质稳定程度较高，并期望他人拥有该类型的特质。

3.1.3.3 研究过程

将 27 个善人格词汇编制成问卷对样本进行施测。首先被试需要回答人口学问题。参考 Goodwin 等(2014)的研究，被试需要针对所有词汇判断其代表性。被试需要想象一下，自己正试图弄清楚一个人有多好，并判断每一个特质对于确定这个人是好人的有用程度是多少。随后被试需要对每个特质的稳定程度进行评价，最后判断对于每个特质，自己多大程度上期望身边的人拥有该特质。所有题目均采用 9 点计分，以各维度特质所有词汇评分的平均数作为该维度的得分。研究者对填写的结果审核通过后，被试将有机会获得一定的金钱报

酬。

3.1.2 研究结果

表 1 显示了各维度的代表性得分，被试对各善人格特质代表性的评分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α = 0.95，各维度 α 值在 0.86~0.93 之间。为直接了解不同特质在个体进行特质判断时的有用程度差异，以四种善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人格特质的代表性得分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四种善特质代表性差异显著，F (3, 357) = 19.79, p < 0.001, η_p^2 = 0.14。FDR 校正结果显示，尽责诚信代表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项善人格特质（与其他三项差异 ps < 0.001）。利他奉献代表性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项人格特质(ps < 0.05)。仁爱友善与包容大度代表性无显著差异，p = 0.64。总结而言，在对善人格进行判断时，各维度的代表性程度从高到低为：**尽责诚信 > 仁爱友善 ≈ 包容大度 > 利他奉献。**

3.2 研究 2b 恶人格特质的代表性差异

3.2.1 研究方法

3.2.1.1 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平台招募被试共 171 名。施测时在题目中加入三道陷阱题目，陷阱题目类型同研究 2a，将没有通过陷阱题目测试或总作答时间低于 2 分钟的被试的作答结果标记为无效作答。最后得到有效被试 140 名（男性 38 名，女性 102 名）。被试年龄范围在 17 到 56 之间，平均年龄为 M = 21.09，SD = 4.66。

3.2.1.2 研究工具

恶人格词汇评定量表。采用焦丽颖等人(2019)研究中得到的恶人格词汇评定量表作为本研究词汇材料。共有 28 个特质词，包含凶恶残忍、虚假伪善、污蔑陷害和背信弃义四个维度。本研究中恶人格特质稳定性和社会赞许性评分一致性 α 分别为 0.95（各维度 α 值在 0.89~0.95 之间）和 0.98（各维度 α 值在 0.90~0.98 之间），每个恶人格特质的稳定性评分都显著高于中等程度，社会赞许性评分都显著低于中等程度，ps < 0.05，表示恶人格词汇有效地反映了个体具有社会道德评价意义的消极内在心理品质。

3.2.1.3 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同研究 2a，被试在回答人口学变量的问题后，需要评价每个特质在判断恶人格时的有用程度，随后评价每个特质的稳定程度，及对于每个特质而言被试期望他人拥有此特质的程度。所有题目均采用 9 点计分，以各维度特质所有词汇评分的平均数作为该维度的得分。研究者对填写的结果审核通过后，被试将有机会获得一定的报酬。

3.2.2 研究结果

表 1 显示了恶人格各维度的代表性得分，被试对各恶人格特质代表性的评分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alpha = 0.97$，各维度 α 值在 0.92~0.97 之间。以四种恶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人格特质代表性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种恶特质代表性差异显著，$F(3, 417) = 57.77, p < 0.001, \eta_p^2 = 0.29$。对方差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事后检验，并对 p 值进行 FDR 校正，结果发现，凶恶残忍代表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项恶人格特质（与其他三项差异 $ps < 0.001$）。虚假伪善代表性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项人格特质($ps < 0.001$)。污蔑陷害与背信弃义代表性无显著差异，$p = 0.36$。总结而言，在对恶人格进行特质判断时，各维度的代表性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凶恶残忍 > 背信弃义 ≈ 污蔑陷害 > 虚假伪善。**

表 1 善、恶人格特质代表性得分

善的维度	代表性		恶的维度	代表性	
	M	***SD***		***M***	***SD***
尽责诚信	7.41	1.22	凶恶残忍	7.27	1.48
利他奉献	6.49	1.59	虚假伪善	5.58	1.87
仁爱友善	6.94	1.27	污蔑陷害	6.68	1.91
包容大度	6.90	1.41	背信弃义	6.78	1.67

3.3 讨论

研究通过对善恶人格特质词代表性的判断，探讨了人们对他人进行善恶人格判断时，不同维度的有用程度存在差异。总结而言，对于善人格，人们如果要判断一个人为善，各人格维度的代表性从高到低分别为：**尽责诚信 > 仁爱友善 ≈ 包容大度 > 利他奉献。**对于恶人格，人们如果要判断一个人为恶，各人格维度的代表性从高到低分别为：**凶恶残忍 > 背信弃义 ≈ 污蔑陷害 > 虚假伪善。**

研究 2 发现当判断不同恶特质对于确定个体是坏人的有用程度时，凶恶残忍维度的代表性是最高的，但研究 1 的结果显示，人们较少地将凶恶残忍维度的词汇（凶残的和残忍的）归于道德范畴。这可能是因为，凶恶残忍的行为带来的伤害性非常大，这类词汇（如，凶残的）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Wood, 2015)，而且经常与犯罪等法律词汇同时出现，导致人们较少地激活凶恶残忍的概念。但当人们单独对“恶”进行判断时，会考虑到极端的恶特质和伤害大的行为，从而更倾向于认为凶恶残忍是恶的核心。但这种核心性是否稳定，仍需进一步验证。

4 研究 3 善恶特质的好恶度和特质度差异

仅用代表性一个指标来说明善恶人格存在特质差序是不够的，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可信，研究3采用好恶度和特质度对该问题再次进行探索。此外，研究2使用了不同的被试对善、恶人格特质的代表性分开考察。但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既面临着对善的评价，也面临着对恶的评价。以往研究也发现，人们对个体的感知和印象形成是善恶兼具的，而且对善恶的看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性(Kaufman et al., 2019; Moshage et al., 2020; 焦丽颖 等, 2019)。因此，后续研究要求被试对善、恶人格都做判断，从而使研究更具有真实性。

4.1 研究方法

4.1.1 被试

研究分两次施测，首次施测过程中加入一道陷阱题目“本题检测您是否认真作答，请选不确定”。首次施测招募被试170名，第二次答题被试161名，流失率为5.29%，剔除未通过陷阱题目的被试，最后得到有效被试 157 名，其中男性 85 名，女性 72 名，平均年龄 *M* = 28.22，*SD* = 5.58。

4.1.2 研究工具

善恶人格词汇表。 同研究 2。

好恶度。被试需要对每个词汇的喜好程度进行 1~7 评分，1 代表非常不喜欢，7 代表非常喜欢。本研究中，善人格好恶度内部一致性 α = 0.94，各维度 α 值在 0.63~0.91 之间；恶人格好恶度 α = 0.97，各维度 α 值在 0.81~0.95 之间。

特质度。 被试需要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给列出的特质词汇的特质度进行评价，在指导语中让被试想象自己正在对一个特质进行判断，询问被试需要多大的行为频率证据能够使自己得出结论。问卷采用 0~10 计分，0 表示从不，10 表示总是。举例而言，如果一个人*总是*表现出某种行为，就会被判断为他是这样的人，可能会在评分中打 9 或 10 分。在评价他人时，每一个特质都有被确认时的最小行为频率水平，如果一个人表现出的行为频率大于这个水平，则会被认为具有该特质，小于这个频率便不会被认为具有该特质。接下来呈现一系列特质词汇，被试需要评估自己在判断一个人拥有该特质时，认为最低需要多大的行为频率证据，仔细思考后选出认为最合适的频率水平。本研究中，善人格特质度内部一致性 α = 0.97，各维度 α 值在 0.80~0.95 之间；恶人格特质度 α = 0.99，各维度 α 值在 0.93~0.98 之间。

4.1.3 研究程序

在 Credamo 见数网络平台上招募被试，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和被试的疲劳效应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被试分两次对问卷进行作答。第一时间段(T1)被试需要对词汇的好恶度进行判断，并填写人口学信息，第二时间段(T2)在一周后进行，被试需要对每个词汇的特质度进行判断。根据被试在网络平台上的 ID 进行数据匹配，每次作答完毕后被试都会得到 3 元作为报酬。

4.2 研究结果

4.2.1 描述统计结果

表 2 描述了各维度特质的特质度与好恶度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善恶的特质词在好恶度上存在差异，人们对于善良特征词汇好恶度(M = 6.26, SD = 0.56)显著高于恶特征词汇的好恶度(M = 1.64, SD = 0.84)，$t(156)$ = 46.70，p < 0.001, d = 6.58 , 95%CI = [4.43, 4.82]；同时，善恶的特质词在特质度上存在差异，善的特质度(M = 7.77, SD = 1.29)显著高于恶的特质度(M = 2.29, SD = 2.24)，$t(156)$ = 25.06，p < 0.001, d = 3.03 , 95%CI = [5.05, 5.91]。善的词汇好恶度与特质度存在正相关 r = 0.38，p < 0.001；恶词汇好恶度与特质度存在正相关，r = 0.21，p < 0.001。

表 2 善恶人格各维度特质度与好恶度得分

特质维度	特质度		好恶度	
	M	*SD*	*M*	*SD*
尽责诚信	8.13	1.24	6.45	0.54
利他奉献	7.15	1.49	5.92	0.66
仁爱友善	7.84	1.36	6.32	0.64
包容大度	7.86	1.50	6.29	0.65
凶恶残忍	2.12	2.32	1.56	0.87
虚假伪善	2.63	2.28	1.80	0.85
污蔑陷害	2.34	2.28	1.63	0.84
背信弃义	2.32	2.29	1.70	0.99

4.2.2 善恶人格各维度好恶度结果分析

以 4 种善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好恶度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维度的特质度差异显著，F (3, 468) = 87.87, $p < 0.001$, $\eta_p^2 = 0.36$。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并对 p 值进行 FDR 校正，结果发现尽责诚信的好恶度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01$，利他奉献的好恶度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01$，仁爱友善与包容大度的好恶度水平没有显著差异，$p = 0.29$。以特质好恶度为衡量标准，各维度差异性好恶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尽责诚信 > 仁爱友善 ≈ 包容大度 > 利他奉献。**

以 4 种恶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好恶度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维度的好恶度差异显著，F (3, 468) =14.27, $p < 0.001$, $\eta_p^2 = 0.08$。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并对 p 值进行 FDR 校正，结果发现凶恶残忍的好恶度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5$, 虚假伪善的好恶度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5$，污蔑陷害和背信弃义的特质度水平没有显著差异，$p = 0.10$。各维度差异性好恶度从低到高分别为：**凶恶残忍 < 背信弃义 ≈ 污蔑陷害 < 虚假伪善。**

4.2.3 善恶人格各维度特质度结果分析

以四种善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特质度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维度的特质度差异显著，F(3, 468) = 82.29, $p < 0.001$, $\eta_p^2 = 0.35$。对方差分析结果做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并对 p 值进行 FDR 校正，结果发现尽责诚信的特质度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01$，利他奉献的特质度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01$，仁爱友善与包容大度的特质度水平没有显著差异，$p = 0.77$。各维度的特质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尽责诚信 > 仁爱友善 ≈ 包容大度 > 利他奉献。**

以四种恶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特质度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个维度的特质度差异显著，$F(3, 468) = 18.46$, $p < 0.001$, $\eta_p^2 = 0.11$。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并对 p 值进行 FDR 校正，结果发现凶恶残忍的特质度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1$, 虚假伪善的特质度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维度，$ps < 0.001$, 污蔑陷害和背信弃义的特质度水平没有显著差异，$p = 0.77$。各维度的特质度从低到高分别为：**凶恶残忍 < 背信弃义 ≈ 污蔑陷害< 虚假伪善。**

4.3 讨论

研究 3 结果再次证实了善恶人格推断存在特质差序。首先，人们对善人格特质的好恶度和特质度评分高于恶。表示人们更喜欢善的特质，如果想要判断一个人是善的，这个人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善行；反之，只需要非常少的行为证据就可以得出一个人是恶的结论，例如，偶尔一两次的虐待动物等。其次，研究发现：在用善恶特质分别进行判断时，其核心程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善人格和恶人格特质的好恶度与特质度均呈现出了差序性结果。

已有研究发现，对于积极类的词汇，强度越大，确认个体拥有该特质越需要更多的行为证据，特质度越高 (Gidron et al., 1993)。在这里，研究者认为，特质的强度反映了该特质能代表善的程度。人们对好人的判断是更谨慎的，越靠近核心地位的特质越基础、越重要，所以需要反复验证。而其他类的特质属于在核心特质之上的“加分项”，只有在个体具有核心特质的前提下，其对判断个体为善的重要性才能依次体现。而人们对于一个人是坏人的判断是更警觉的，特质越靠近恶的核心，越需要更少的行为证据，特质度越低。这符合善恶判断的不对称性和特质度判断的互补性，意味着在对善人格进行特质-行为推理时，人们遵守的是**“最大阈值”**原则，越是核心的特质，需要的行为证据越多；而对恶人格进行特质-行为推理时，遵守的为**“最小门槛”**原则，越是核心的特质，需要的行为证据越少。

此外，特质度和好恶度的评分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研究 1 和研究 2 的差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道德时较少使用凶恶残忍的特质词汇。但是，该类特质词一旦被激活，影响力便是极大的。人们对其好恶度的评价最低，哪怕个体表现出的行为频率非常低（甚至是偶尔一次），也会被推断为具有对应的凶恶残忍特质。

5 研究 4 善恶人格维度重要性差异

研究 2 和研究 3 都是基于李克特式量表进行判断，所得到的代表性、好恶度和特质度的结果都是被试单独对每个特质词汇判断的结果。当将两个维度的特质放在一起让被试进行对比时，是否依旧会重复该研究结果仍待考察。因此，研究 4 拟通过排序的方式，再次验证前面研究结果得到的“最核心”与“最边缘”的两类特质是否真的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

5.1 研究方法

5.1.1 被试

在网络上招募被试 200 名，剔除没有完整作答的被试后，得到有效被试 188 名。其中男性 60 名，女性 128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M = 28.06，SD = 10.60。

5.1.2 研究程序

在问卷星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告知被试该研究是关于善恶判断的一项研究。让被试想象自己正试图弄清楚一个人的善恶程度，但每个人拥有的特质是不同的，有些特质对于自己判断善恶重要性较高，有些则相对较低。随后呈现 8 对善恶的特质词汇（4 对善词汇和 4 对恶词汇，下称 8 组特质集）让被试对这些特质对于判断一个人为善/恶的重要性进行排序，1 为更重要，2 为更不重要。8 组特质集随机选自善恶人格词库，并且研究者在施测前进行了随机配对。其中，善特质属于尽责诚信和利他奉献两个维度，恶特质属于凶恶残忍和虚假伪善两个维度。

在问卷最后，被试需要填写性别、年龄等人口学信息。参与本研究的被试均为自愿者，没有接受实验报酬。

5.2 研究结果

5.2.1 对特质集的预分析

对数据进行预分析测试不同特质集排序的一致性，以确定是否可以将几组特质集的特质排序合并计算。参考 Piazza, Goodwin 等(2014)的研究数据处理方式，首先建构一个变量以作为每个被试的排序情况与预测排序情况相匹配程度的数字指标。建构该指标的公式如

下：

$$R_i = (-1) \times R_{ia} + 1 \times R_{ib}$$

$$= R_{ib} - R_{ia}$$

其中，R 代表排序值，i 代表了第几组特质集，*a* 为该组的尽责诚信维度特质（或凶恶残忍维度特质），*b* 为该组的利他奉献维度特质（或虚假伪善维度特质）。

因此，每个被试将有 4 个善和恶的特质集排序指标数据，数据值越大（即为+1 时），表示排序结果和研究假设的预测结果更匹配，即：在判断善时，尽责诚信的重要性更高；在判断恶时，凶恶残忍的重要性更高。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善而言，四组特质集的排序指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范围为 0.17 到 0.31，$ps < 0.05$；对于恶而言，四组特质集的排序指标同样也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范围为 0.36 到 0.55，$ps < 0.001$。因此，在后续研究分析时，将四组特质集的排序平均值作为该维度的排序结果。

5.2.2 主效应分析：排序假设检验

采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对善的两个维度排序得分检验，结果发现，尽责诚信的重要性排序(M = 1.39, SD = 0.32)显著在利他奉献(M = 1.61, SD = 0.32)之上，Wilcoxon test z = -4.57，$p < 0.001$，d = 0.71。对恶的两个维度排序得分检验结果发现，凶恶残忍的重要性排序(M = 1.26, SD = 0.33)显著在虚假伪善(M = 1.74, SD = 0.33)之上，Wilcoxon test z = -7.89，p < 0.001，d = 1.41。采用 G*Power 3.1(Faul et al., 2007)进行敏感分析以估计在 $\alpha = 0.05$（双尾）水平上达到 85%功效的效应量值。结果显示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足够敏感的最小效应为 d = 0.22，本研究中的所有效应量都大于该最小效应量值。

表 3 显示了各维度特质集的排序详细结果，可以看到，各组排序集中，除了第三组尽责的与无私的在排序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三组尽责诚信的重要性都显著高于利他奉献。而在恶的特质集排序中，四组排序结果都显示了一致的结果，即在判断一个人为恶时，凶恶残忍维度的重要性更高。

表 3 各维度特质集排序

人格	特质集	维度	n	*M*	*SD*	*z*
善	组 1	可信任的	108	1.43	0.50	-2.04*

		肯奉献的	80	1.57	0.50	
	组 2	诚信的	129	1.31	0.47	-5.11***
		见义勇为	59	1.69	0.47	
	组 3	尽责的	92	1.51	0.50	-2.92
		无私的	96	1.49	0.50	
	组 4	正直的	130	1.31	0.46	-5.25***
		热心公益的	58	1.69	0.46	
恶	组 1	无恶不作的	136	1.28	0.45	-6.13***
		伪善的	52	1.72	0.45	
	组 2	残忍的	139	1.26	0.44	-6.56***
		善于作假的	49	1.74	0.44	
	组 3	凶残的	132	1.30	0.46	-5.54***
		表里不一	56	1.70	0.46	
	组 4	伤天害理的	148	1.21	0.41	-7.88***
		虚伪的	40	1.79	0.41	

注： n 表示该组选择此特质为第一重要的个案数； $^{*}p < 0.05$， $^{**}p < 0.01$， $^{***}p < 0.001$。

5.3 讨论

排序的方法在探讨特质差序时具有一定的优势性，在对一系列的特质进行逐个判断时，被试很容易给许多特质都赋予较高或较低的值，研究 4 通过排序的方式，直接迫使被试优先考虑他们的选择，更清楚地展现了不同特质的重要性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在对他人进行善恶人格特质判断时，尽责诚信和凶恶残忍重要性位于首位，再次验证了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假设。

善恶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问题，本研究对比了核心和边缘两种特质的重要程度差异，在关注结构层次两端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中间层次特质的重要性。未来研究可以将所有四个维度放在一起比较确认核心、中间和边缘的特质类型，对各特质的重要性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6 总讨论

人们在感知、思想和行为上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善恶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与善恶信念及行为等相关的人格特质(Kaufman et al., 2019; Moshagen et al., 2018)。对这类人格特质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人类本性中积极的、以成长为导向的一面(de la Iglesia & Solano,

2018; Maslow, 1962; Peterson & Seligman, 2004)，也为探究人性中消极的、阴暗的一面提供了重要信息(Paulhus & Williams, 2002; Welner, 2009)。善恶人格基于中国文化，整合了以往相关理论观点与实证研究，力求形成一个更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焦丽颖 等, 2019)。

基于善恶人格的结构，本研究通过 4 个研究共 5 个子研究（N = 787）考察了善恶人格结构的差序特点。研究 1 结果发现，当人们对人格的道德范畴进行判断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善人格。研究 2~4 通过代表性、好恶度、特质度和重要性排序四个方面的指标发现：当判断人是“善”时，各维度的核心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尽责诚信 > 仁爱友善 ≈ 包容大度 > 利他奉献；当判断人是“恶”时，各维度的核心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凶恶残忍 > 背信弃义 ≈ 污蔑陷害 > 虚假伪善。

6.1 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模型

本研究根据人们进行道德范畴词汇选择的首位度和善恶推断时不同特质的核心程度，将善恶人格特质的结构进行层次区分，提出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模型，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1）善恶人格间的横向差序；（2）善恶人格内的横向差序，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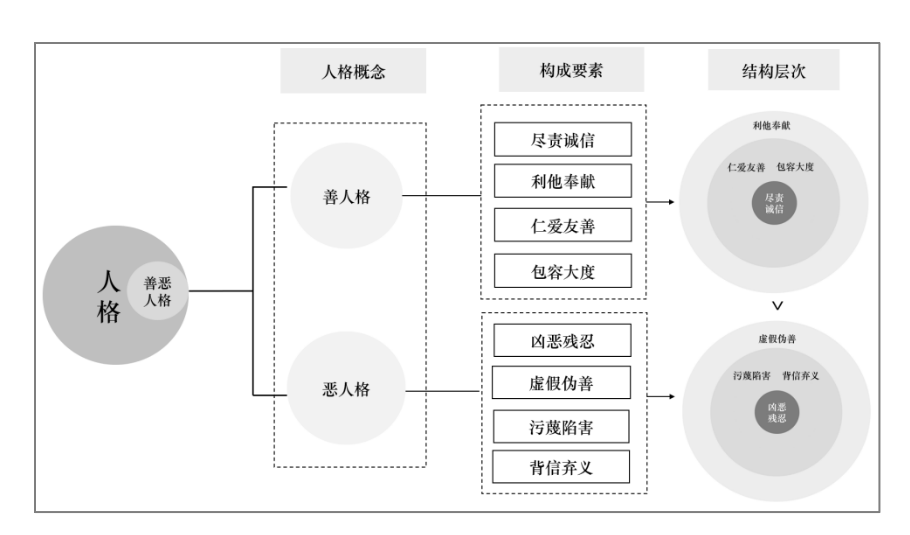


图 3 善恶人格特质差序模型

善恶人格间的差序体现了人们在道德认知中善或恶的可及性高低，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恶人格，善人格具有优先效应。这与中国文化下“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相吻合，例如，孟子强调“善端”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点的基础，善良之心是人内心固有的，“善”是中华伦理思想的核心(孔繁岭, 2006)。儒家文化下提倡的人性本善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有深远的影响(张和云 等, 2018)，从而使人们在对善恶思考时倾向于将

善放在首位。王阳明也曾提到："夫心主于身，性具于心，善原于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与王纯甫书二》），"至善者，心之本体"（《传习录》），指出人的本性是至善的。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会随着历史的传承渗透到大众的行为和认知中，在中国追求善、规避恶的文化下，当提及伦理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时，人们倾向于更快地启动道德概念的积极价值，首要想到的是仁、义、礼、智、信等善良因素。因此，尽管在道德评价中善与恶总是成对出现，人们对道德相关概念进行选择时仍显示出了善人格的优先效应。

善恶人格内的差序分析了善或恶的不同人格特质的核心程度，通俗而言，根据人们在判定一个人是"好人"或"坏人"时，最看重的是人的哪类特质或哪种行为表现，分别区分出了善人格和恶人格各自内部不同特质的优先效应。以往的思想理论和研究结果也为该结果提供了支持(Klein & Epley, 2014; Marcus et al., 2018)。对于善的探讨中，古人言"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诚信是人安身立命之本，"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诚实-谦恭在人格的六因素模型(HEXACO)中位于第一因子(Ashton & Lee, 2007)，在预测与善恶相关的人格或行为因素时，相比其他人格维度，诚实-谦恭人格贡献最大(Book et al., 2015; Thielmann et al., 2020)。类似的，研究发现：诚信在道德知觉中具有中心作用，在不同的群体和关系中，"诚实"和"可信任"这些特征都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Cottrell et al., 2007; Goodwin, 2015; Weiss et al., 2020)。而对于恶的探讨中，了解其本质的一个有效的心理学方法便是研究与之相关的人格特质(Book et al., 2015)，以往也有研究者尝试探究恶人格的核心(Book et al., 2007; Moshagen et al., 2018; Jones & Paulhus, 2010)，证实恶特质有着共同的暗黑核心成分，即人际操纵和冷酷无情(Jones & Paulhus, 2010; Jones & Figueredo, 2013)。

此外，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模型衍生出来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人们对善恶的思考和判断是复杂的。以善为例，在前期研究中，我们曾让被试回答了"什么是善"，并列举出善者具有的人格特征，在所收集到的 482 个词汇中，"助人"、"无私"等特质出现的频率是偏高的(焦丽颖, 2021)。图 4 显示了善人格特质的词汇云图，字体越大表示人们提及的频率越高。在关于道德原型的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自由列举了高道德的人具有的特征，并对罗列出的特征出现的频率进行排序作为日常可及性的指标，将高可及性的特征作为道德原型(Smith et al., 2007; Walker & Pitts, 1998)，从图 4 可以看出，"助人为乐"更倾向于是人们的"善"的原型。



图 4 善词汇云图

但是，善人格的特质差序结果却发现利他奉献对判断善的核心程度最低，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善恶的原型和善恶的推断使用的认知加工方式不同，可及性程度高并不代表这个特质在判断一个人善恶时的重要程度高。人们对善恶进行定义时，是基于直觉、自动加工的过程，但人们思考某个特质对于判断一个人善恶的重要性时，是深思熟虑、理性分析的过程。通俗对比而言，以“诚信的”（尽责诚信维度）和“无私的”（利他奉献维度）为例，当人们提取善的概念时，更容易想到无私这一特质，但当判断这两种特质哪个对于判断一个人是善更重要时，人们会选择诚信作为首要标准。对于善人格特质判断而言，前者是基础，因此个体对尽责诚信的特质判断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的行为证据。对于研究中发现的此问题，我们将在未来研究中做进一步的验证。

本研究所探讨的特质差序问题，旨在发掘人们对善恶特质认知的层次性。但需要明确的是，即使不同特质对于人们进行善恶判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其核心特质就足够了。任何善恶人格特质都有其自身的独特部分，如果只关注其中的某个品质的培养或预防，人格发展或社会运行就有可能失衡。

6.2 理论思考

本研究对善恶的理论思考有一定的启发：善恶人格内的差序反映出人们维持生存的心理原则。善恶是决定人们有效生存的品质，善（或恶）带来的保障性（或伤害性）是影响人们安全生存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人类具有趋利避害倾向(Carver & Scheier, 2021)，顺利辨别他人互惠行为是否真实（即具有保障）能够有效地获得利益、趋近快乐，同时快速

识别到他人行为是否存在伤害有助于避免威胁、回避痛苦。以往研究也证实了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明确他人是否会帮助或伤害自己，并且对他人善意或恶意的预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行为(Goodwin et al., 2014; Weiss et al., 2020)。

因此，善人格的差序性遵循保障性原则，反映了他人提供帮助行为的保障程度差异。首先，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而言，基于社会交换所形成的互惠行为，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适应性问题，即：帮助者必须确保其提供的利益在将来可以得到回报(Buss, 2011)。对于善人格的差序，保障性呈现**趋中递增趋势**，越靠近善的核心，该特质能够为帮助者提供的保障性越大。虽然都是善，利他奉献、仁爱友善和包容大度、尽责诚信给人们带来帮助的保障性是依次增强的，使自己与他人交往更有安全感和信心。其次，信任在社会关系的运作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人具有独特的社会性，在人际关系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信任和合作是人类社会性的基础(Cottrell et al., 2007)。此外，康德(1968/1986)曾指出责任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严格的或狭义的责任是一种完全的责任，是大家必须履行的道德规则，例如信守承诺。广义的责任是一种不完全的责任，人们遵循了这样的行为准则是值得被赞扬和奖励的，但这种责任并没有绝对的强制性，例如助人奉献，本研究结果从一定程度支持了道德存在差序的观点。

恶人格的差序性遵循伤害性原则，反映了他人行为对个体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的差异。在人们看来，虚假伪善、背信弃义和污蔑陷害、凶恶残忍带来的伤害程度可能是逐渐增加的。对于恶人格的差序，不同特质的伤害性同样呈现**趋中递增趋势**，越靠近恶的核心，该特质带来的伤害性是越大的。道德意识的结构将伤害和不道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伤害是道德判断中最重要的领域，被认为是道德认知的典型和社会关系中道德冒犯的原型，道德判断的核心便是感知到的伤害(Gray et al., 2012, 2014; Piazza, Landy et al., 2014; Schein & Gray, 2016)。

总结而言，善的差序遵循保障性原则，恶的差序遵循伤害性原则，均体现趋中递增趋势。表 4 对善、恶人格特质差序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表 4 善、恶人格内特质差序关系梳理

差序类别	原则	趋势	评价指标			
			代表性	好恶度	特质度	重要性

善人格差序	保障性	趋中递增	+	+	+	+
恶人格差序	伤害性	趋中递增	+	−	−	+

注：表格中 + 表示越靠近善/恶的核心，得分越高；− 表示越靠近善/恶的核心，得分越低。

6.3 意义

以往关于道德特质重要性的研究多是基于西方文化，而西方的道德理论可能存在着文化隐性偏见，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心理(喻丰, 许丽颖, 2018)。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情”，注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而西方在人际交换过程中更追求平等(周明洁 等, 2021)。本研究基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语言和思维方式，融合中国文化和西方科学范式，探究了人们对善恶的评价与认知，为善恶判断的内容和领域整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而且通过对善恶特质重要性的深入探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研究者在中国文化下对家庭、友谊、工作等人际交往领域进行社会认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有关善恶或道德领域的社会现象和研究是多元化的，包括信任、牺牲、慈善、助人、欺骗、凶杀、抢劫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内容中，是否包含一个共有的心理框架，使人们在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能够将它们纳入到善恶范畴并区分其核心程度？善恶人格特质差序模型试图解答该问题，探索了人们在进行善恶判断时，更看重的是哪种心理品质，这对理解善恶特质信息的价值提供了新启示。而且善恶人格从人格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善恶行为背后的基本人格倾向深入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从人格视角了解社会生活中的善恶现象及人们对个体的善恶评价。

此外，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模型为人格结构多样化表现指出新的探索方向。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人格的纵向层次，采用高阶因子模型或双因子模型构建人格结构模型，但较少有人探讨同一层次的人格特质的重要性是否也存在差序。本研究初步尝试区分善恶人格不同维度特质的横向差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格结构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

6.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在人格心理学层面对善恶人格的理论内容进行了探讨，抛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但是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只关注了被判断特质的差序性，而没有考察影响善恶判断的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个体因素方面，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对人格特质

做出是善还是恶的判断属于直觉判断，而强调某种道德直觉的人也更有动力发展相关的人格特质(Hill & Roberts, 2010)，那么，个体的人格水平是否会对其善恶判断的差序性产生影响？这是一个仍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情境因素方面，随着他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人们对他人的道德评价、积极消极情感等方面也表现出了差序(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喻丰, 许丽颖, 2018)，因此后续研究也需要关注诸如关系等因素如何影响善恶判断的差序性。

其次，研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法，该方法较为依赖被试的自我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与真实表现产生偏差。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现场研究的方法，在真实社会情境中探讨该问题，这能够更加凸显善恶人格研究的实践意义。并且可以进一步尝试打破人格心理学与道德心理学的学科界限，在神经科学领域对善恶人格进一步的探讨，在理论上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偏少，而随着人格心理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大规模数据探究人格相关问题(e.g., Hartung et al., 2021; Soto et al, 2011)，因此，后续可以使用更大、更有代表性的样本对本研究结果加以证实。第四，未来研究可以对善恶和不同效价的非道德类词汇进行对比，从多方面考察善恶特质的独特性和差序性。进一步而言，善恶间的整体差序探讨了人性善恶观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未来可以进行更丰富、更严谨和更深入的研究。

7 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善恶人格的特质差序模型，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

（1）善恶人格间的差序：善的优先效应。在人格的道德范畴中，存在善人格的优先效应。

（2）善恶人格内的差序。善的核心由内到外分别为：尽责诚信、仁爱友善与包容大度、利他奉献；恶的核心由内到外分别为：凶恶残忍、背信弃义与污蔑陷害、虚假伪善。

（3）善恶人格内的差序中，善的差序遵循保障性原则，恶的差序遵循伤害性原则，均体现趋中递增趋势。

参考文献

Abele, A. E., & Wojciszke, B. (2007). Agency and Comm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Versus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5), 751–763.

Anderson, N. H. (1968). Likableness ratings of 555 personality-trait wor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272–279.

Allen, N., Birch, S., & Sarmiento-Mirwaldt, K. (2018). Honesty above all else? Expecta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political conduct in three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6*(3), 511–534.

Allport, G. W. (1937).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shton, M. C., & Lee, K. (2007).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tages of the HEXACO model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2), 150–166.

Baumert, A., Halmburger, A., & Schmitt, M. (2013). Interventions Against Norm Viol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8), 1053–1068.

Benjamini, Y., & Hochberg, Y. (1995). Controlling the False Discovery Rate: A Practical and Powerful Approach to Multiple Test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Methodological), 57*(1), 289–300.

Berkowitz, L. (1999). Evil is more than banal: Situationism and the concept of evi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246–253.

Book, A. S., Quinsey, V. L., & Langford, D. (2007). Psychopathy and the perception of affect and vulnerability.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4*(4), 531–544.

Book, A., Visser, B. A., & Volk, A. A. (2015). Unpacking "evil": Claiming the core of the Dark Tria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3*, 29–38.

Brambilla, M., Rusconi, P., Sacchi, S., & Cherubini, P. (2011). Looking for honesty: The primary role of morality (vs. sociability and competence) in information gathe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135–143.

Brambilla, M., Sacchi, S., Menegatti, M., & Moscatelli, S. (2016). Honesty and Dishonesty Don't Move Together: Trait Content Information Influences Behavioral Synchrony.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40*(3), 171–186.

Brambilla, M., Sacchi, S., Rusconi, P., & Goodwin, G. P. (2021). The primacy of morality in impression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4, 187–262.

Buss, D. M. (2011).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4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Cattell, R. B. (1950). Personality: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Study. New York: McGraw-Hill.

Carver, C. S., & Scheier, M. F. (2012). Cybernetic Control Processes and the Self-Regulation of Behavior.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uman Moti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 F. F., Hayes, A., Carver, C. S., Laurenceau, J. P., & Zhang, Z. (2012). Model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variance in multifaceted constructs: A comparison of the bifactor model to other approach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1), 219–251.

Cawley, M. J., Martin, J. E., & Johnson, J. A. (2000). A virtues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5), 997–1013.

Cottrell, C. A., Neuberg, S. L., & Li, N. P. (2007). What do people desire in others? A socio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valued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2), 208–231.

Dai, J. (2007). *The human standards and social standards of good and evi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戴景平. (2007). *善恶的人性尺度和社会尺度*(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de la Iglesia, G., & Solano, A. C. (2018). The positive personality model (PPM): Exploring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personality assessm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13.

De Raad, B., & Van Oudenhoven, J. P. (2011). A psycholexical study of virtues in the Dutch language, and relations between virtues and person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1), 43–52.

Ellemers, N. (2017). *Morality and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Behavior: Groups as Moral Anchors*. Taylor and Francis.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G., & Buchner, A. (2007). G*Power: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9*(2), 175–191.

Fazeli, S. A. (2019). Meanings of foundational virtue in islamic mystical ethics: A case study of honesty. *Religious Inquiries*, *8*(15), 59–80.

Feng, X., Xue, X. D., & Cai, S. S. (2016). Scope of trait: Inductive reasoning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Academics in China,* (1), 110–115.

[冯雪, 薛小迪, 蔡曙山. (2016). 特质度: 人际知觉过程中的归纳推理. *学术界,* (1), 110–115.]

Ge, X., & Hou, Y. (2021). Confucian ideal personality traits (*Junzi personality*) and mental health: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s of self-control and authenticit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3*(4), 374–386.

[葛枭语, 侯玉波. (2021). 君子不忧不惧：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与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心理学报*,

53(4), 374–386.]

Gidron, D., Koehler, D. J., & Tversky, A. (1993). Implicit quant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594–594.

Goodwin, G. P. (2015). Moral character in person percep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 38–44.

Goodwin, G. P., Piazza, J., & Rozin, P. (2014). Moral character predominates in person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1), 148–168.

Gouveia, V., Vasconcelos de Oliveira, I. C., Moura Grangeiro, A. S. de, Pereira Monteiro, R., & Lins de Holanda Coelho, G. (2021). The bright side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Evidence of a measure of prosocial trai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2*(3), 1459–1480.

Gray, K., Waytz, A., & Young, L. (2012). The moral dyad: A fundamental template unifying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Inquiry*, *23*(2), 206–215.

Gray, K., Schein, C., & Ward, A. F. (2014). *The myth of harmless wrongs in moral cognition: Automatic dyadic completion from sin to suffer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4), 1600–1615.

Guo, Y. (2016). *Personality research*.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郭永玉. (2016). *人格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uo, Y. (2010). *Establishment for moral personality vocabulary assessment*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郭永军. (2010). *道德人格词汇评定量表的编制*(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大学.]

Hartung, J., Bader, M., Moshagen, M., & Wilhelm, O. (2021).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ly aversive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ill, P. L., & Roberts, B. W. (2010). Propositions for the study of mora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6), 380–383.

Huang, X., Zhang, S. (1992). Desirability, meaningfulness and familiarity ratings of 562 personality trait adjective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05), 17–22+63.

[黄希庭, 张蜀林. (1992). 562 个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和熟悉度的测定. *心理科学*, (05), 17–22+63.]

Jiao, L. (2021).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ies: Structures,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trait inference, and applica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焦丽颖. (2021). *善恶人格的结构、特质差序及其功能*(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Jiao, L., Yang, Y., Guo, Z., Xu, Y., Zhang, H. & Jiang, J. (2021).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good and evil character traits (GECT) scal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2*(2), 276–287.

Jiao, L., Yang, Y., Xu, Y., Gao, S., & Zhang, H. (2019). Good and evil in Chinese culture: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connot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1*(10), 1128–1142.

[焦丽颖, 杨颖, 许燕, 高树青, 张和云. (2019). 中国人的善与恶: 人格结构与内涵. *心理学报*, *51*(10), 1128–1142.]

Jonason, P. K., & Webster, G. D. (2010). The dirty dozen: A concise measure of the dark tria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2*(2), 420–432.

Jones, D. N., & Figueredo, A. J. (2013). The core of darkness: Un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Dark Triad.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7*(6), 521–531.

Jones, D. N., & Paulhus, D. L. (2010). Different provocations trigger aggression in narcissists and psychopath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 12–18.

Jones, D. N., & Paulhus, D. L. (2014). Introducing the Short Dark Triad (SD3): A brief measure of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Assessment, 21*(1), 28–41.

Kant, I. (1986).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L. Miao, Tran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康德. (1986).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Kaufman, S. B., Yaden, D. B., Hyde, E., & Tsukayama, E. (2019). The Light vs.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Contrasting two very different profiles of human na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26.

Klein, N., & Epley, N. (2014). The topography of generosity: Asymmetric evaluations of prosocial 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6), 2366–2379.

Klein, N., & O'Brien, E. (2016). The tipping point of moral change: When do good and bad acts make good and bad actors? *Social cognition*, *34*(2), 149–166.

Kong, F. (2006). *Zhonghua Lunli Fanchou·Sh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孔繁岭. (2006). 中华伦理范畴 • 善.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upperman, J. (1991). Charact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dy, J. F., Piazza, J., & Goodwin, G. P. (2016). When it's bad to be friendly and smart: The desirability of sociability and competence depends on mor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9), 1272–1290.

Landy, J., Piazza, J. R., & Goodwin, G. (2018). Morality traits still dominate in forming impressions of oth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5*(25), 5636.

Marcus, D. K., Preszler, J., & Zeigler-Hill, V. (2018). A network of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darknes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3*, 56–62.

Maslow, A. (1962).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NY: Wiley.

Morales-Vives, F., De Raad, B., & Vigil-Colet, A. (2014). Psycho-lexically based virtue factors in Spain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41*(4), 297–325.

Moshagen, M., Hilbig, B. E., & Zettler, I. (2018). The dark cor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25*, 656–688.

Moshagen, M., Zettler, I., Horsten, L. K., & Hilbig, B. E. (2020). Agreeableness and the common core of dark traits are functionally different construc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87*, Article 103986.

Mu, S., & Gu, H. (2010). Development of the Virtue Adjectives Rating Scale and Research on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3), 310–313.

[沐守宽, 顾海根. (2010). 美德形容词评定量表的编制及其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3), 310–313.]

Neumann, C. S., Kaufman, S. B., ten Brinke, L., Yaden, D. B., Hyde, E., & Tsykayama, E. (2020). Light and dark trait subtypes of human personality – A multi-study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4*, 1–11.

Paulhus, D. L., & Williams, K. 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6), 556–563.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P. (2004).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azza, J., Goodwin, G. P., Rozin, P., & Royzman, E. B. (2014). When a virtue is not a virtue: Conditional virtues in moral evaluation. *Social Cognition*, *32*(6), 528–558.

Piazza, J., Landy, J. F., & Goodwin, G. P. (2014). Cruel nature: Harmfulness as an important, overlooked dimension in judgments of moral standing. *Cognition*, *131*(1), 108–124.

Reeder, G. D. (1993). Trait-behavior relations and dispositional infer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5), 586–593.

Reeder, G. D., & Brewer, M. B. (1979). A schematic model of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in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6*(1), 61–79.

Roivainen, E. (2013).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English personality adjectives: Implications for personality

theor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4), 417–420.

Roivainen, E. (2016). A folk-psychological ranking of personality facets. *Current Issue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4*(4), 187–195.

Rothbart, M., & Park, B. (1986). On the confirmability and disconfirmability of trait concep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1), 131–142.

Schein, C., & Gray, K. (2016). Moralization and harmification: The dyadic loop explains how the innocuous becomes harmful and wrong. *Psychological Inquiry*, 27, 62–65.

Shklar, J. N. (1984). *Ordinary vi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ryack, J., Steger, M. F., Krueger, R. F., & Kallie, C. S. (2010). The structure of virtu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virt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6), 714–719.

Smith, K. D., Smith, S. T., & Christopher, J. C. (2007). What defines the good perso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experts' models with lay prototyp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8*(3), 333–360.

Soto, C. J., John, O. P., Gosling, S. D., & Potter, J. (2011). Ag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10 to 65: Big Five domains and facets in a large cross-sectional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330–348.

Thielmann, I., Spadaro, G., & Balliet, D. (2020). Persona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1), 30–90.

Wang, D. F., & Cui. H. (2005).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personal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登峰, 崔红. (2005). *解读中国人的人格*.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alker, L. J. (2004). Gus in the gap: Bridging the judgment-action gap in moral functioning. In D. K. Lapsley, & D. Narvaez (Eds.), *Moral development, self, and identity* (pp. 1–20). Mahwah, NJ: Erlbaum.

Walker, L. J., & Hennig, K. H. (2004). Differing conceptions of moral exemplarity: Just, brave, and car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629–647.

Walker, L. J., & Pitts, R. C. (1998). Naturalistic conceptions of moral matu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 403–419.

Wang, Y., & Guo, B. (201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s' moral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6), 1436–1440.

[王云强, 郭本禹. (2011). 大学生道德人格特点的初步研究. *心理科学*, *34*(6), 1436–1440.]

Wei, Q., Li, M., & Chen, X. (2018).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perception: Is warmth or competence more importan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0*(2), 243–252.

[韦庆旺, 李木子, 陈晓晨. (2018). 社会阶层与社会知觉: 热情和能力哪个更重要?. *心理学报, 50*(2), 243–252.]

Weiss, A., Michels, C., Burgmer, P., Mussweiler, T., Ockenfels, A., & Hofmann, W. (2020). Trust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Welner, M. (2009). The justice and therapeutic promise of science-based research on criminal evil.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4*, 442–449.

Willis, J., & Todorov, A. (2006). First impression: Making up your mind after a 100-Ms exposure to a fa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592–598.

Wojciszke, B., Bazinska, R., & Jaworski, M. (1998). On the dominance of moral categorie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12), 1251–1263.

Wood, D. (2015). Testing the lexical hypothesis: Are socially important traits more densely reflected in the English lexic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2), 317–335.

Yan, G., & Liu, T. (2005). The Traditional Five-Fact or Personality Theory of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780–783.

[燕国材, 刘同辉. (2005). 中国古代传统的五因素人格理论. *心理科学, 28*, 780–783.]

Yuan, X., & Guo, S. (2017).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Evidence from 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 (EAST).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03),651–656.

[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中国人人际情感的差序格局关系:来自 EAST 的证据. *心理科学*, (03),651–656.]

Yu. F. (2014). *Psychology of virtue: What, why and how*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喻丰. (2014). *美德的实证心理学研究：存在、涵义、分类及效应*(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 北京.]

Yu, F., Peng, K., Dong, R., Chai, F., & Han, T. (2013).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s of Moral Personalit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2), 2235–2244.

[喻丰, 彭凯平, 董蕊, 柴方圆, 韩婷婷. (2013). 道德人格研究：范式与分歧. *心理科学进展, 21*(12), 2235–2244.]

Yu, F., & Xu, L. (2018). Chinese moral structure: a moral differential circle.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65–74.

[喻丰, 许丽颖. (2018). 中国人的道德结构:道德差序圈.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65–74.]

Zhang, H., Huang, J., Huang, C., Wang, W., & Hu, C. (2019). Are wise men necessarily benevolent? A reflection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virtu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2*(3), 761–767.

[张昊天, 黄金豪, 黄成利, 王炜, 胡超. (2019). 智者必怀仁?智慧与美德的关系辨析. *心理科学*, *42*(3), 761–767.]

Zhang, H., Zhao, H., & Xu, Y. (201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virtuous personality and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8*(3), 221–227.

[张和云, 赵欢欢, 许燕. (2018). 中国人善良人格的结构研究. *心理学探新*, *38*(3), 221–227.]

Zhou, M., Li, F., Mu, W., Fan, W., Zhang, J., & Zhang, M. (2021, in press). Round Outside and Square Inside: The Latent Profile Structure and Adaptability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周明洁, 李府桂, 穆蔚琦, 范为桥, 张建新, 张妙清. (2021, 印刷中). 外圆内方：中国人人际关系性的潜在剖面结构及其适应性. *心理学报*.]

Zuo, B., Dai, T., Wen, F., & Suo, Y. (2015). The big two model in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8*(4), 1019–1023.

[佐斌, 代涛涛, 温芳芳, 索玉贤. (2015). 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 *心理科学*, *38*(4), 1019–1023.]

The Hierarchies of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y Traits

JIAO Liying[1,2], XU Yan[1], TIAN Yi[3], GUO Zhen[1], ZHAO Jinzhe[1]

([1]*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

Researchers found that moral information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impressions of individual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person perception, most of them distinguish moral character from other traits such as ability and sociability, and examined the priority and dominance of moral information. Howev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predict people's behavior in more specifically, it is not enough to distinguish morality from other types of traits. Fiv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trait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perceptions of other people's moral (good and evil) levels?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moral level is fundamentally to judge their level of good and evil. The concept of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ies proposed by researchers in Chinese culture, conducts a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moral and immoral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Study 1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re was a hierarchy between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asked to select which traits belong to morality, the frequency of good personality traits that participants selected was more than evil personality traits. Both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y traits were selected more often than non-moral traits. In Study 2, two sub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presentativeness (i.e., the degree of usefulnes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good or evil personality in judging whether an individual is "good" or "evil". The results of study 2a showed that when people judged a person as "goo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each dimension from high to low was: conscientiousness and integrity > benevolence and amicability ≈ tolerance and magnanimity > altruism and dedication. The results of study 2b showed that when people judged a person to be "evil",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each dimension from high to low was: atrociousness and mercilessness > faithlessness and treacherousness ≈ calumniation and circumvention > mendacity and hypocrisy. In Study 3, desirability and the scope of trait were used

as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s to verify the hierarchies of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y traits inference. The scope of trait describes the minimum behavior frequency that people need to identify a trait. Results showed that desirability and the scope of trait of each dimension were consistent to Study 2.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s were also demonstrated by ranking method in Study 4. When people need to judge the good and evil degrees of a person, they thought that the conscientiousness and integrity dimens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ltruism and dedication; and the atrociousness and mercilessness dimens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endacity and hypocrisy.

People always show different patterns of good and evil in thoughts, feelings and behavior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personality traits related to good and evil. The study of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y contributes to people's basic understanding of good and evil. Moreover, the hierarchies model of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y traits which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tent of good and evil judgment.

Key words Good and evil personalities, Personality structure, Hierarchy, Scope of trait, Chinese culture